

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 与中国人口問題

王亞南

科学出版社

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與中國人口問題

王亞南

科学出版社

1956年12月

內 容 提 要

本書分为兩個部分，一是資產階級人口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一是中國人口問題及其解決途徑。第一部分在論述人口問題的諸表象及其本質后，即對資產階級學者有关人口理論的代表學說——馬爾薩斯主義予以概括地批判，并深入地揭露其階級實質。然后系統地闡明馬克思在其大著“資本論”中的嶄新的人口理論。第二部分，作者歷述了中國歷史上的人口問題及其产生的原因后，着重揭露在中國現代反帝反封建斗争過程中出現的新舊馬爾薩斯主義，对那些在中国較有深刻影响的馬爾薩斯主义者如布克(J. L. Buck)、羅爾綱、陳長蘅等的形形式式論調，予以堅決的駁斥。本書的最后一段，說明解放后中國人口問題的性質，指出舊社會所遺留下來的失業現象，正隨着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逐步在消失。对目前還存在的馬爾薩斯主義的殘余思想，作了必要的分析和批判。

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 與中國人口問題

著 者 王 亞 南

出版者 科 學 出 版 社
北京朝陽門大街 117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61 号

印刷者 北京新華印刷廠

總經售 新 華 書 店

1956年12月第 一 版 書號：0637 印張：3 3/8
1956年12月第一次印刷 版本：767×1092 1/16
(京) 0001—11·360 字數：52,000

定价：(9) 道林本 0.60 元
 报紙本 0.42 元

序

有关人口理論——人口規律的問題，牽涉到整个社會經濟生活領域。因而，在社会科学的論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当着当代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御用学者，把一切反动的社会學說，經濟學說乃至生物學說揉杂在他們的人口理論中，構成所謂新馬爾薩斯主义思想体系，为帝国主义者奴役并屠戮落后地区人民，在思想上鋪平道路的时候，人口理論的研究，就更显得有了异常重大的現實意义，可是到目前为止，我們学术思想界有关这方面的努力，是非常不够的，这个小小論著的問世，是希望能引起我們社会经济学家乃至对此有兴趣的自然科学者的足够重視。

近年以来，由于若干社会人士的倡议，节育运动已經在各方面引起了相当广泛的注意。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會議中，邵力子先生曾提出“請加强避孕常識宣傳和放寬节育限制”的提案，他認為“这是关系广大群众切身利益問題，而目前已采取的方法，确还未能滿足群众的要求”，所以，他“除了希望医务工作者再进一步研究节育的办法之外，还希望衛生领导机关采取积极的措施，加强避孕常識的宣傳，放寬节育技术的限制”，主張把避孕的常識，由都市傳播到农村，扩大避孕藥的供应範圍。衛生机关确实很重視邵力子先生这个提案的意見，在今年六月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會議上，衛生部長李德全的發言，就着重提到，“关于有利于妇嬰的健康，子女的教育，民族的繁榮而实行的节育問題，我們宣傳不够。今后应在党和政府領導下，結合有关單位，进一步地展开宣傳教育工作和加强技术指导工作”。邵先生对于这段話非常滿意，他在大會中还專門就這個問題，作了一次發言，主張施行手术的限制，还应进一步放寬，并認真介紹了某中医証驗有效的避孕方法，即活吞蝌蚪多少条，多少次，即可多年不孕或永久不受孕的單方。关于邵先生的节育主張和衛生部在这方面的努力，我除了衷心希望它真正会“有利于妇嬰的健康，子女的教育，民族的繁榮”外，沒有什么意見。我在这里所不能已于言的，只是这种节育的宣傳运动，会不会在我們思想上引起什么副作用。我的这个論著，既是依据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来考察中国人口問題的解决途徑，我就有責任对这个問題作一交代。我以为，对于节育問題，也正如对于其他社会問題一样，資产阶级有一个看法，馬克思主义者有另一个相反的看法。关于資产阶级的或馬尔薩斯主义的节育論，我在本書中已談得相当詳細了，它的要点，就是認定社会一切貧困罪惡，都是由于人口对养活人的生活資料过剩，或人口对生产生活資料的土地过剩，而生活資料不够的

人，又是限于劳动人民或比較落后的民族，于是，把包括着最和平的避孕术到最猛烈的細菌原子彈在內的一切方法，用来限制或减除这些多余的过剩的人口，就成为他們根絕社会貧困罪惡的紧急要圖。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主义者既把国内外劳动人民看作他們的贖罪的羔羊，沿着他們的思想綫索来厉行节育，就無异承認我們是应当忍受細菌和原子弹灾难的对象。解放以后，尽管以往把我們社会的貧困，罪惡，愚昧，孱弱乃至动乱的根源，都归之于我們的人口过剩过多的錯誤見解，都給事实駁倒了，但畢竟因为我国人口非常众多，又畢竟因为解放时期尚短，百廢待兴，一般人民生活水平还不可能很快提高起来，于是国内外对中国人口众多怀抱杞憂的人，或者耽心我們人口太多会不会妨碍生产力的提高，或者耽心我們的人口太多会不会向外扩张侵略。这样那样的臆測或私議是存在的。目前的节育宣傳运动，是否和这种种想法有关，我未敢断言，但人們把节育問題和人口問題联系起来考虑，以至把贊同节育的人看做贊同馬尔薩斯主义人口理論的人，却是很有可能的。所以，尽管我們在邵力子先生的提案中，發言中，無法明确他的主張是否把馬尔薩斯的人口理論作为依据，但为了防止新旧馬尔薩斯主义的傳播和滋長，是有必要就我們当前的节育問題，依据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論來簡單加以分釋的。在馬克思主义者看来，人是社会最宝贵的財富。人們的劳动，就是他們的幸福的保証和源泉。問題就要看他們的劳动或劳动力，是否得到合理的安排和利用。人口过剩或劳动人口过剩，無非是特定社会的产物，是社会財富分配不平等的产物，是劳动人口及其劳动力沒有得到合理安排的結果，从而归根結底，是生产关系限制或束縛生产力的矛盾的尖銳表現。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由于逐漸消灭了阶级剥削，消灭了失業，从而消灭了过剩劳动人口，以至人口迅速大量增加，反而經常感到劳动力不足的社会現實，已經充分証明了馬克思主义者从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是否适合，來說明劳动人口是否过剩的真理的無比正确。依据这个真理，我們当前提倡节育，决不能把我国是世界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这一点作为理由，我們最多只能这么說：我們原来是一个經濟落后的国家，我們要像苏联那样徹底消灭阶级剥削，全面而迅速的發展社会主义生活，还須通过一个較为曲折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我們还不能一下子消灭失業人口，也还只能在發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漸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于在社会生活福利方面，帮助減輕生育子女过多者的困累和負担，还不免要受到物質的和其他社会条件的限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允許生育子女过多者，有条件地实行节育，并向一般不大懂得如何节育的劳动人民，作一些啓蒙性的节育宣傳，那宁可說是合情理的，必要的。而且，生育子女，特別是生育子女过多过密，在任何社会，都可能給生育者以不少的困累，同时对于被养育的子女，也会引起照顧無法周到的缺憾，这就是为什么在今日根本消灭了失業并还經常感到劳动力缺

乏的苏联社会，仍不禁止多子女者或生产过密者采行种种节育的办法。我希望这正是邵力子先生提倡节育的动机，也相信这正是卫生部门对节育采行若干指导措施的出发点。如果真是这样，如果我们能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节育问题，那我们在当前提倡节育声中，就用不着犹心我们一向相当广泛存在的马尔萨斯主义的残余思想，又由此借尸还魂地复活了。

最后，我还有必要指明一下，这个论著的初稿，曾在厦门大学本年四月举行的科学讨论会中，作为一篇科学论文，提出讨论，由参加讨论会的校内外人士，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我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若干订正和补充。因此，书中如有错误的地方，虽不敢要他们代我负责，但有必要在这里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1956年9月9日于厦门大学

统一書号：3031·

定 价：道林本 0.60
報紙本 0.42

目 錄

序

引 言

一 資產階級的人口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

- (一) 人口問題的諸表象及其本質 (3)
- (二) 資產階級的人口理論——馬爾薩斯主義 (6)
- (三) 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的建立 (15)

二 中國的人口問題及其解決途徑

- (一) 中國歷史上的人口問題 (24)
- (二) 在中國現代反帝反封建鬥爭過程中出現的新馬爾薩斯主義 (28)
- (三) 解放后的中國人口問題的性質及其解決途徑 (25)

引　　言

中國是今天世界上人口最为众多的國家。

據1955年6月15日聯合國秘書處發表的報告，世界人口在1954年中為二十五億兩千八百三十萬人⁽¹⁾而中國在1953年6月30日的人口普查數字，為六億零一百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一人⁽²⁾。我們差不多占有全世界總人口的四分之一。

人口多到這個程度，凡屬關心中國問題的人，就很容易聯想到中國的人口問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諸兄弟國家，以及許多同我國建立了友好關係並和我們一道爭取世界和平的國家，都極其興奮地看到我們這樣眾多的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教育下，已經團結組織成為生產建設上和對國內外敵人鬥爭上的無比巨大的力量。可是，在另一方面，在一切帝國主義分子乃至支持帝國主義政策的御用學者們的心目中，我們眾多人口表現的力量，却像對於他們是一種威脅。不錯，對於長期奴役中國人民並還企圖繼續奴役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來說，那確是一種致命的威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從戰火中鍛鍊過來，覺悟起來，並堅決要求從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解脫出來的亞非各國廣大人民，早就使帝國主義者殖民主義者感到頭痛。他們除了在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採取一慣的分化，收買和血腥鎮壓的策略外，並還在思想上動員起最反動最沒有人性的馬爾薩斯主義，特別是把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和仇視人類的法西斯主義相結合而形成的新馬爾薩斯主義。把社會飢餓、貧困、罪惡、戰爭的原因歸之於自然的規律，歸之於世界人口對於可供食用的生活資源的絕對過剩，特別是在他們看來，依據優生原理，依據適者生存原理，早就應當淘汰的亞非各國的人口的過剩。他們宣揚鼓吹這種冷酷的仇視人類的學說，其主要目的，無非是要轉移國內勞動人民特別是落後殖民地人民的鬥爭目標，同時並還為他們實行發動屠殺毀滅人類的細菌戰原子戰在思想上鋪平道路。我們應當記得，美帝國主義者在朝鮮進行細菌戰，不是用這種學說來激勵他們的空軍人員，要他們拿出勇氣與良心來完成毀滅任務么⁽³⁾。

(1) 那個報告中關於中國人口數字，是應用1948年發表的人口統計材料，見1955年7月17日人民日報。

(2) 見1954年8月7日人民日報。

(3) 在朝鮮戰役中，被俘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佛蘭克·赫·許威布爾的供詞（見新華月報1953年3月號，第63—69頁），表明美國軍官在接受投擲細菌彈，毀滅朝鮮平民密集區時，還有些疑慮，那不過從反面証實新馬爾薩斯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的教育，還被灌輸得不夠透徹。

在帝國主義者御用的馬爾薩斯主義和新馬爾薩斯主義的宣傳影响下，在解放以前，我們的知識界或社會論壇上曾經非常普遍地把我們的众多人口看作我們社會貧困，罪惡與戰亂頻繁的根本原因，即使到了解放以後，特別是在六萬萬的人口數字公布以後，把過多人口看作是一個壓力，一個負擔的想法，在我們高級知識份子中間，仍旧大有人在。

人是社會最寶貴的財富，人是創造繁榮幸福生活的最基本的動力。為什麼嫌人口過多？為什麼引起人口過剩呢？那決不是由於什麼人口對生活資料對土地的自然壓力或自然規律的作用，而根本是由於以私有財產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不允許對有用的寶貴的人力作合理的利用和安排。人口問題，就是社會制度問題。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生產方式，就有不同性質的人口問題。馬克思主義者曾就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下的，隨著資本積累而必然發生的人口過剩問題，指出了資本主義制度所特有的人口規律，那對於馬爾薩斯主義者所編造的任何社會都必然要發生的人口絕對過剩的胡說，早已理論上根本予以否定。自从消滅了階級剝削，也消滅了失業或人口過剩現象的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出現以後，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已經從社會實踐上證明是無比的正確。但真理和事實，對於在垂死掙扎中的沒落階級，只會激起更無理性更無人性的反應。這就是為什麼新馬爾薩斯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更加猖獗的原因。

在帝國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正在全面展開尖銳鬥爭的今天，新馬爾薩斯主義已經被帝國主義陣營利用為進行思想鬥爭的最重要的法寶。他們以此對抗反殖民主義，以此對抗馬克思主義，並還進一步把這種學說拿來配合它們的法西斯主義的野蠻侵略活動。一句話，新舊馬爾薩斯主義已經很突出的表現為最反動的資產階級的一種代表意識形態。

中國是長期遭受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國家，在我們的有識人士中間，馬爾薩斯主義的思想毒素，是相當根深蒂固的，加以我們不但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在解放以後，人口的增殖還非常迅速，於是，帝國主義分子就故作危言，認定中國必然因為人口過多走上侵略他國的道路，而國內的一些有識人士，亦怕過多人口影響生活水平的提高，因而懷抱杞憂，十分放心不下。所以，無論從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思想鬥爭上講，抑或是從清除資產階級思想殘余來堅定我們建設信心的實踐上講，都有必要依據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來正視中國的人口問題的現實，並給予新舊馬爾薩斯主義以無情地批判和抨擊。

為了說明的便利，本文將分兩個部分來展開研究。一是資產階級的人口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二是中國的人口問題及其解決途徑。

一、資產階級的人口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的人口理論

(一) 人口問題的諸表象及其本質

在政治經濟學上，人口被看作是“整個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¹⁾。

一個社會的人口的密度，人口在城市，農村的分布情況，在各不同生產部門間的分布情況以及人口的階級劃分情況，那誠然都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同時却也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它的經濟發展的速度和人民生活的水平。在這裡，人口問題就發生了，各種人口理論也相應發生了。究竟人口要保持怎樣的密度，要怎樣在不同地域不同生產部門分布，要怎樣在各階級間劃分，才對於社會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利，否則就是不利呢？意見紛紛，莫衷一是。不過，把以往有關人口問題的意見或理論綜括起來，彷彿一般對於人口在城鄉的分布是否適當，人口在各階級間所占的比例的大小如何，並不會引起嚴重地論爭，而一直成為問題，並一直在剝削階級論壇上發生爭吵的，往往是集中在社會的人口的適當密度上面，或者至少可以這樣說，他們有關人口的地域分布和階級分划的不同看法，大體是非常含混地糾纏在社會總人口是多了還是少了的密度問題上面。究竟人口多了好，還是少一些好呢？問題被這樣提出來，以資本主義社會來講，恰好反映着它的上升和沒落的兩個不同階段。在整個資本主義的手工製造業階段，乃至由手工製造業向着機械工業過渡的那一段時間，一方面因為手工業製造業還是以勞動力為主體，因而非常需要勞動人口，同時又因為這種生產組織又不能引起農業方面的根本變革，因而不能把農民從農村驅向都市。於是，從英國開始，用各種立法手段破壞農村，驅逐農民，接着就用那些在身上烙字，割去耳朵乃至殺頭一類的嚴刑峻法把被驅逐“散而之四方”的浮浪游惰者，趕到比牢獄還壞的作坊或手工製造場所中⁽²⁾，而對於企圖偷偷逃往國外的人，更定有非常嚴厲的懲罰條例。英國以外的其他西歐德、奧、法諸國，差不多是照英國的樣子如法炮製。美國原來就不像西歐各國那樣存在有封建制度支配下的農村，過着原始氏族社會生活的土著的印地安人，又被那些歐洲殖民者剿滅或驅逐到僻遠的山區了，結果，那裡工業上乃至農業上需要的勞動人口，就只好由那些

(1)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人民版中譯本，第162頁。

(2) 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七篇“所謂原始積累”那一章，馬克思用血與火的文字，依據無數千真萬確的事例，描述了那個悲慘的剝奪過程。

在非洲采用各種欺騙壓迫野蠻手段把當地土著人民變成奴隸來得到供給。可是，事實儘管如此，歐美的剝削階級及其代言者，並沒有十分意識到：把人口從農村驅往都市，把那些獨立的農民階級變成隸屬於工場作坊老板或資本家的雇傭劳动者；把非洲的狩獵者畜牧者變成美國的工農劳动者，已經是在處理安排人口的地域分布和階級分划的問題，他們一味籠統地強調人口的重要性，強調人口愈多愈好，特別是像德奧那样一些長期被戰爭犧牲了大量人口的國家，無疑是更強調得有勁。大約由十五世紀到十八世紀上半期那個歷史階段，差不多一切經濟學者的論著，都習慣于把人口放在首要的地位來討論，而德國奧國稱之為官房學家的重商主義者們幾乎沒有例外地都是些大人口論者或多人口論者⁽¹⁾。可是好景不長，現實狀況比思想變得更快。經濟向前迅速發展，人口增殖率也在迅速提高，就這當中，那個以勞力為主的手工製造業階段逐漸轉移到以機械為主的大工業階段了，劳动人口已經不像以前那麼需要了，同時，大工業一發展到相當程度，就不僅要對都市手工製造業引起技術革命，也要對農村的舊式生產組織從根本引起社會革命，結果，農民變成無產階級，變成雇傭劳动者，已經無須用剿滅農村，用鞭撻烙印或殺頭的刑罰來把農民驅往城市的種種手段了，他們像是潮水般地自發自動地到他們應到的地方去了。這一來，人口之流，就開始漫溢起來，人口不是不足，而是過多了，於是，在資本主義發展走先了一步的英國，也率先感到這個問題的麻煩。當經濟落后的德奧等國還在繼續發揮大人口論多人口論的時候，英帝國已開始強調適當人口論或強調“少一點，好一點”的人口論了。極有代表性的馬爾薩斯的人口理論，就是這樣產生的。這是我要在下面詳細論到的。

事實上，在一切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裡面，儘管統治者照例籠統地把人口少了或多了作為問題，但他們看得嚴重感到頭痛的，一般倒不是在前進的階段感到人口過少，而是臨到沒落的階段感到人口過多。因為人口少了，像在封建社會的統治者階級那樣，用招撫流亡休养生息一类辦法，就可以對付過去，而在資本主義初期，如我在上面談到的那些為統治階級所雷厲推行的變農民為無產者的辦法，雖然殘酷一些，在他們自己，並不感到怎樣難過。若人口過剩了，過剩到以社會規模的失業、貧困、飢餓和死亡的現象

(1) 奧國最著名的官房學者松勒福爾斯(Sonnefels)在其1763—67年刊行的“警察商業及財政原理”中說：“人口數愈大，對於外敵侵攻的抵抗力愈大……人口愈大則欲望愈多，內部食養之道亦愈多。人口愈多，則外國貿易的原料，即耕作與勤勞的成果，愈覺豐富。十個人就有十個欲望，對於他的職業，是營利的手段，生活的手段。十個人就有十種營業，增加了十個人，同時就增加了十個欲望，增加十種營利之業”。——轉引自拙作政治經濟學史大綱第81—82頁。

表現出來，那就不免要威脅到所在社會制度本身的存在。就因為這個緣故，人口的問題便被理解為人口過剩問題，彷彿歷史上根本就不會存在過人口不足的這個階段。他們為什麼這樣不顧歷史事實，或忽視那些分明代表著那種事實的思想言論呢？那是不能單由統治階級對於人口不足問題比較容易解決，因而就比較不重視這個問題來解釋的，更重要的原因，應當說是由於剝削階級的代言人要單單抓住人口過剩這一面，把人口問題歸結為人口過剩問題，才便於他們得出這樣結論，即人口問題是與一切社會形態相獨立的自然規律作用的問題，彷彿從原始社會以來，大地上儘管只存在着非常有限的人口，那點人口仍舊由貧困飢餓和爭奪獵場牧場的戰爭狀態表現了他們的過剩，此後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有貧困飢餓和戰爭狀態存在，以此推論，當然都是表現著人口過剩狀態的存在。人口問題，就這樣變成了一個和人類社會相始終的超歷史的自然性質問題。

由於他們把所有的人口問題，歸結為人口密度或數量問題，又進一步把數量問題歸結為數量過多或人口過剩問題，並認定這是無可避免的自然性質的問題，他們就用這個指導思想，就人口的性別、年齡、職業、地位、文化知識水平，以及人口所屬的種族，所在的地域等等方面，考察問題的症結。他們考察的結論，儘管措詞和強調程度不尽相同，但大體是一致的，就是高級的有文化修養的有錢的人少生育，反之，則多生育；因之，人口過多過剩，總是表現在下層階級，窮苦人或貧困種族間，到處如此，就說這是一種非人力所可挽回的自然現象。從這裡，顯示他們的研究又深入了一層，即把人口過剩問題，再歸結為被奴役被榨取壓制的勞動人口過剩或落後民族或地區的人口過剩的問題。這就無怪每個人口過剩論者，在不同程度上，都是消費階級必要論者⁽¹⁾，都是生物的適者生存論者，都是劣等種族淘汰論者。然而人口問題的本質或其社會的階級的性質，却從他們的荒謬的邏輯推論上暴露無遺了；誰能設想，一個社會的勞動人口，社會的直接生產者，經常处在貧困飢餓狀態中，變為多餘的，同時，那些不事生產的人，那些游惰荒淫的吸血鬼，倒富有起來，變為社會所必要的，這種顛倒反常的情況，是由於自然的安排嗎？人口問題並不是什麼自然性質問題，而是一個在不同歷史時期，乃至同一歷史時期的各不同發展階段都表現了不同內容不同性質的社會問題。在階級社會裡面，離開了階級，人口便是一個沒有現實意義的抽象；離開了社會經濟結構，階級也是一個空洞的名詞。人口問題是從整個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從而有關這個問題的說明及其根本解決，也必須從這裡下手。

(1) 為了避免由生產過剩引起的危機，馬爾薩斯特別強調由大地主什一稅收入者構成的消費階級必須保持並擴大；其他人口過剩論者不是講消費階級必要，而是冠冕堂皇地講優等種族必要。說法不同，大意是一樣的。

馬克思的人口理論，就是從人口問題的社會階級本質出發的，它對於資產階級學者依階級利害偏見片面地皮相地摭拾一些表象所編造的謠說，給予了無情的批判。但這裡得指明一點，馬克思主義的整個經濟學說，雖然是在批判資產階級經濟理論中吸收其合理的健康的成分創建起來的，但資產階級學者有關人口問題的理論，却極少具有科學的內容，就連大經濟學者亞當斯密、李嘉圖也非例外。這原因，不僅只是因為人口問題本身極密切地聯繫到社會貧富階級的問題，從而，討論起來，更需要解脫階級的偏見；同時還因為人口問題關係到整個社會經濟結構，就資本主義社會來說，關係到資本的積累或發展，不深入到資本生活的內部，就無法有正確的理解。現在且先把資產階級學者有關的代表學說概括地予以批判的揭露，然后再看馬克思在其大著“資本論”中，是怎樣科學系統地展開他的嶄新的獨創的人口理論的。

（二）資產階級的人口理論——馬爾薩斯主義

近代資產階級的自然主義的人口理論，是以英國馬爾薩斯在1898年出版的“人口論”中的意見作為代表。馬爾薩斯主義和資產階級的人口理論，已經成為同義語了。但這個看法，並不是說，這一大套理論的發明權是屬於馬爾薩斯，馬爾薩斯牧師是一個剽竊專家，在經濟學上，他的價值理論是剽竊自西斯蒙第；他的地租理論是剽竊自安徒生；而他的人口理論的出處，馬克思是這樣告知我們的：“如果讀者記起1798年刊行‘人口論’的馬爾薩斯，我就要以下面的事實提醒讀者，就那部書最初的形式來說，它不過是對於德福（Defoe），斯杜亞（Staart），湯生德（Townsend），佛蘭克林（B. Franklin），瓦拉斯（Wallace）一輩人的言論，加以小學生樣淺薄的，牧師樣改頭換面的剽竊。裡面沒有包含一個創造性的命題”⁽¹⁾。至于這個理論為什麼到了馬爾薩斯手中，就變得特別重要特別引人注意起來，那是要由英國當時的具体歷史情況來加以說明的。在十八世紀下半期特別是七十年代以後，英國的工業革命及隨後不久發生的農業革命，在以極迅速的步伐向前發展，當然財富也在以相應的速度增加，被題稱為“國民之富的性質及其原因之研究”的亞當斯密的大著“國富論”，就非常樂觀地反映著當時這一方面的光明前景。可是在階級社會里，好事總有它叫人不愉快的反面。由農業革命造成的農村小農的普遍失業與流離失所，由工業革命造成的都市一般劳动者的貧困與罪惡，致使亞當斯密所理想的“自由王國”竟變成了“令人驚嘆的悲慘國度”，連他原來的忠實信徒，也大聲疾呼“財富數量的增加和幸福數量的減少”⁽²⁾。這情況，對於初期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為資本

(1)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774頁注。

(2) 見西斯蒙第：“新經濟學原理”，第二版序言。

主義塗飾的玫瑰顏色，已顯得頗不調和了。當 1789 年的法國大革命的凶報傳播到英國以後不久，高德文（William Godwin）那部痛烈攻擊私有財產制度，把私有財產制度看為是貧困罪惡的根源和人類理性的翳障的著作“政治正義論”於 1793 年出版了，在翌年，法國康多塞（Condorcet）又公刊“人類精神發達的歷史觀察”，同樣攻擊私有財產制度，這在西歐各國思想界造成一種恐怖的情緒。就在這種環境和氣氛下，牧師馬爾薩斯起來捍衛私有財產制度了。因為高德文那部著作談到：私有財產如果廢除了，貧富區別沒有了，一切貧困罪惡均可絕迹，雖人類繁殖，難免不為理想社會實現的障礙，但智能發達的人類，屆時自知節制生育，適可而止。馬爾薩斯就從他這段話的後半截鑽空子，把時人及前人有關人口过剩引起貧困罪惡的理論，偷襲在他那本小冊子裏面，用以答復對於私有財產制度的抗議和非難。這就使得英國的寡頭政治，認為它可以看作是對於高德文康多塞等人的學說的万應消毒劑，“可用以徹底鏟除掉一切要求人類進步的希望，而報之以歡呼”⁽¹⁾，所以，馬克思說：“那部小書，竟會名噪一時，全是由於黨派利害的關係”⁽²⁾，全是由於資產階級要拿這一套無稽的謠話，來迷惑視聽，鎮定人心。經過資產階級這一捧，資產階級的人口理論，就變成了馬爾薩斯的專刊。無怪馬爾薩斯自己也為他的意外成功，感到驚愕了。

馬爾薩斯主義的出發點或基本論點，就在於論証人類社會的貧困罪惡，不是由於社會的原因，而是由於自然的原因，也就是說，不是由於私有財產制度引起的結果，而是由於自然規律作用的結果。馬爾薩斯在他的“人口論”中，是以人口問題為中心，就人口和食物或生活資料的關係來展開他的說明的。他先從人類天性出發，定立下兩個自有人類以來就一直無可變易的兩個命題。

1. 食物是人類生存所必要的。
2. 兩性間的情欲是必然的，并且，大體總會像現在這樣⁽³⁾。

馬爾薩斯提出“食色性也”的這兩大命題，就是為了把他的大理論，建立在這種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事實，同時，任何人都會理解的常識的基礎上。想從常識引出科學。他是這樣運用邏輯的。有了兩性，就必然有兩性的情欲關係，也就必然要增殖人口，人口增殖起來，接着就會發生食物問題。食物的增加與人口的增加，究竟是那一方來得有力呢？兩者間究竟是保持着怎樣一種比例呢？馬爾薩斯斷定：人口的增加較之食物的增加遠為迅速。他告訴我們：“人口任其增殖不加妨礙時，按幾何級數率增加，若生活資料，

(1)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 775 頁。

(2) 同上，第 774—775 頁。

(3) “人口論”，第一版，世界書局版中譯本，第 5 頁。

那不过是按算術級數率增加，略有數學知識的人，大概都知道前者的增加力，遠較後者為大”⁽¹⁾。但何以見得人口的增加是按幾何級數率，而食物的增加是按算術級數率呢？馬爾薩斯發現生活資料較歐洲各國豐富的美國，人口曾于二十五年內增加一倍，所以他據此推定：“人口若是沒有妨礙其增殖的原因存在，每二十五年加一倍，或以幾何級數率增加”⁽²⁾。至于食物，他認為，在最初二十五年，雖可因開拓土地，獎勵農業等種種方法，增加一倍，但到第二個二十五年就不行了。盡地之力，窮人之力，能做到算術級數率的增加，還算萬幸。食物既為人類生存所不可少，人口的增加，就勢必要與食物的增加，保持平衡，即食物只能按照1、2、3、4、5、6、7的算術級數率增加，它就妨礙人口按照1、2、4、8、16、32的幾何級數率增加，換言之，就是使人口增殖受到限制。限制有兩個方面：一是預防限制，如殺嬰墮胎等等。一是積極限制，如飢餓，貧困等等，他並還在其他場合指出：“尚有婦女方面的不道德習慣、大都市、不衛生的製造業、奢侈、疫病及戰爭”⁽³⁾。所有這些限制，他認為“都可適當的還元作貧困與罪惡”⁽⁴⁾，靠了這些限制，人口增加乃得與食物增加保持平衡，所以，在原書第七章末尾⁽⁵⁾他提出了人口原理的三段論法：

第一，“人口增加必然要受生活資料的限制”；

第二，“生活資料增加，人口也常隨着增加”；

第三，“占優勢的人口增加力，為貧困與罪惡所抑制。因之，致使現實的人口，得與生活資料保持平衡”。

從他提出的這個人口原理的三段論法中，已經把前述高德文康多塞等就社會貧困罪惡加在私有財產制度上的責任，推得干干淨淨了，貧困罪惡是一種自然傾向，是調節人口食物使之趨於均衡的必然結果。人類食與性的兩大要求不能改變，人口增加超過食物增加，從而要用貧困、饑餓、疫病、戰爭來調節人口的自然規律，就不能不發生作用。反過來說，要使一個社會避免這些不愉快的現象，要使人過著幸福的安逸生活，那是違反自然，違反人類天性的妄想。他用下面這樣堅決的論調，來回答理想社會的憧憬者。

“人口繁殖力與土地生產力間自然是不平衡的，而大自然法則却必須繼續使其結果

(1) “人口論”，第一版，世界書局版中譯本，第7—9頁。

(2) 同上，第10頁。

(3) 同上，第47頁。

(4) 同上，第48頁。

(5) 同上，第68頁。

平衡。这就是社会完成途上横着的大困难，我認為無法克服，……对于这貫通全生物界的法則的重压，我看人类沒有擺脫的可能……因之，要社会全体人的生活都安乐幸福而比較閑暇，对于他自身及其家族的生活資料供給，都不用焦心，那是無論如何办不到的”⁽¹⁾。

不过，作为牧师的馬爾薩斯，絕不会忘記宣傳那种產生貧困与罪惡的無可克服的大自然法則，是由神的安排。要改变它，要根絕貧困与罪惡，只有期之于“最初調整世界組織的神力，有某种直接活動。但神为了創造物的利益，依然是按照固定法則，來遂行宇宙上种种作用”⁽²⁾。慈祥的神，作出这样悲觀絕望的世界秩序，畢竟未免太殘酷了一些。于是这位牧师在他的“人口論”第二版中，就把原來过于硬化的論点，改得和緩了一点，認為人类为了避免因过剩人口引起的貧困饑餓戰爭，还可用道德的節欲方法，事先預防。他把这一个“大發現”，看作是第二版对第一版有了革新內容的特点。節欲原是非常平凡的道理，不过，馬爾薩斯結合英國当时社会的实况，作了非常不平凡的透辟發揮，使資產階級更加贊賞滿意。因为他之所謂道德限制，就是指着一个人沒有維持家族能力时，不应結婚；并且在那个时期，还須保持道德行为，不得有不正当的情欲关系。人类既能依道德行为，即依他的理性，限制人口，那末，由貧困由罪惡限制的人口，就要減少；換言之，人类理性多增一分，人类的貧困与罪惡便要減少一分。

这一來，他不是和他所痛烈攻击的康多塞的訴之于理性來根絕社會貧困与罪惡，來根絕社會的私有財產制度的見解，有某种程度的接近么？但恰好相反，馬爾薩斯只是要劳动的貧民訴之于理性，不能結婚，便不要勉强結婚，以免繁殖出养不活的人口，來加重有錢人的救恤施舍的負担。他們这样冷酷無情地告訴我們：“我們貧民自己，就是他們自身貧困的原因，救济手段，把握在他們自己手里。他們所在的社会，統治他們的政府，都沒有救济他們的能力，……他們的劳动工資，不够瞻养家屬……偏偏要从事結婚，那决不是对于社會履行义务，却是加重社會無用的負担，同时并使自身陷于貧困”⁽³⁾。貧民自己陷于貧困，對他們加以救济，就等于鼓励貧困，所以他反对济貧法，反对一切慈善的救济。言外并表示貧困者愈受磨折，就对于惡行是一种惩罚，对于善行是一种鼓励。他因此坚决反对人类社会平等的講法，他認為“人类不平等这件事，对于善行提供了一种自然報酬。一个社会如充滿了向上希望和失足的恐怕空气，那無疑是最適于人类精神和才能的發展的，最適于人类德行的實現和改善的”⁽⁴⁾。“歷史証明实行平等主义的社

(1) “人口論”，第一版，世界書局版中譯本，第8頁。

(2) 同上，第6頁。

(3) “人口論”，第二版，普及本第二册，第170頁。

(4) 同上，第25頁。